

丁

卯

集

笺

证

玉树歌残王气终，景阳兵合戍楼空。

松楸远近千官冢，禾黍高低六代宫。

石燕拂云晴亦雨，江豚吹浪夜还风。

英雄一去豪华尽，唯有青山似洛中。

江西
人民
出版社





丁卯集笺证

【罗时进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丁卯集笺证/罗时进著

—江西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8

ISBN 7-210-01906-5

I. 丁…

II. 罗…

III. 文学-唐诗-古籍

IV. I207

责任编辑:姚继舜

封面设计:揭同元

校订审读:舒宝璋

丁卯集笺证

罗时进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江西南昌红十字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8年8月第1版 1998年8月第1次印刷

开本:850mm×1168mm 1/32 印张:13.5

字数:430千 印数:1—1000册

ISBN 7-210-01906-5/I·364 定价:20.00元

江西人民出版社地址:南昌市新魏路17号

邮政编码:330002 传真:8511749 电话:8511534(发行部)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

钱仲联

古诗笺证之事，肇始于毛亨为《诗三百篇》作传，东汉郑玄据传作笺。后代笺诗，拓其囿于《诗三百篇》之外，萧统《文选》选录古诗至夥，唐李善暨五臣俱为之注。此言诗总集之注也。于诗家别集之注，其多无过杜甫诗集，千家注杜，号为壮观。迄于清代，诗家笺注，已成专门之学。然笺诗初非易事，必才、学、识兼备者始克胜任；才力低下、学识疏浅者不能为也。

门人罗君时进，从余为博士研究生。君有志三唐至清代诗学，积学覃思，多有创获。其于许丁卯，精心探讨十余年，在《文学遗产》、《学术月刊》等杂志发表多篇论文，并有专著《晚唐诗歌格局中的许浑创作论》付梓；又感于丁卯旧槧每多遗阙，渊源不清，真伪相参，且注本简陋，行世不广。君积数年之功，撰成近四十万言之《丁卯集笺证》。余观君稿，融校笺与考论于一冶，引征广博，疏解切当，考证详核，非专心学术、邃密深沉者岂能造此境。旧集编帙，颇为混乱。康熙朝彭定求等十人驻扬州诗局编校《全唐诗》，取钱牧斋、季沧苇递辑唐诗稿本之长，其中丁卯诗分体纂辑，风貌独特。今君稿更为增广，编成十二卷，并辑附历代评论，资料颇为丰富，不惟旧貌一新，且甚便于学者研究与利用也。

唐代诗集整理，近年来成果累累，而《丁卯集》之整理本尚未得见，颇为学界所瞩目和期待。今君笺证稿梓行，填补此一空白，能促进晚唐诗歌以及唐代文学之研究无疑也。君嘱余引喙，余故乐为之而不辞。

岁在丁丑，仲冬之月，虞山钱仲联撰。时年九十。

前 言

许浑，生于贞元四年(788)，卒于咸通初年(860)稍后。字用晦，一作仲晦。行七。润州丹阳人。

许浑的家世，《新唐书·艺文志四》记载为“圜师之后”，《唐诗纪事》卷五六、《郡斋读书志》卷一八、《唐才子传》卷七皆承此说。这一记载虽然简略，却是相当可靠的。

首先，宋人胡宗愈《唐许用晦先生传》可证^{〔1〕}。《传》云：“公讳浑，字用晦，谯国公绍五世孙也。祖讳自明，由平舆适云阳邑西北陵，因仁其里而卜筑焉。父忱，有隐德。”“谯国公绍”即许绍，两《唐书》有传。他儿时与唐高祖同学，特相友爱。大业末，为夷陵郡通守，政绩颇著，后授硤州刺史，封安陆郡公。高祖曾降敕书，以“通家曩好”相称。绍生四子：善、伯裔、智仁、圜师。四子中圜师在唐高宗显庆、龙朔间拜相，最为显赫。《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列圜师三子：自牧、自遂、自正。这里并未尽列，《旧唐书·许圜师传》中提到又一子“自然”即可补。胡宗愈《传》提及的“自明”，亦当是圜师嫡传，与自牧等同辈。宗愈，北宋人，距许浑生活的年代不很远，其叙许浑支胤所出，自当有据。

其次，金石铭文亦可佐证。1982年元旦在镇江市东南丁卯桥附近发掘了一大型唐代银器窖藏，有瓮、盒、盆、碟、碗、筷等共九百五十余件。其中大多数银器上篆刻着“力士”二字。从有的银器只刻有“力”字，未刻“士”字，可知“力士”二字非酒具名称。再从“力士”二字篆刻的部位看，不但刻在器具底部、圈足内外这些不显眼的地方，而且还刻在勺柄、箸等上部明显之处，且唐代银器并无“物勒工名”之制，则又可知“力士”二字并非工匠名或贡品名。这一刻在器物某一部分，任意以其中某一字来标志私物的铭文必当是主人的名字。唐代“力士”最著名者莫过于高

力士，然其为潘州人，原是岭南冯盎鲁孙，圣历元年由岭南入京，天宝初进封渤海郡公。史籍所载，皆未见其与润州京口有关的行迹。而许浑恰有别墅在润州丁卯桥，《丁卯集》即在这里编纂。《元和姓纂》卷六和《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均记载许圜师有一侄（即许善长子）名力士，官至洛州长史，袭祖父谯国公爵位。这批银器很可能是许圜师任宰相后许力士赠送的，后来代代相传至许浑手中。

清康熙中许大定尝编《许氏族谱》，该谱记载许氏传承为：敬宗，字延族，唐右相，子昂，昂子彦伯，彦伯子望，望子远，远子岷，岷子文腾，文腾子浑，浑子仲元，仲元子儒。此谱自岷以上，与《元和姓纂》卷六所载许氏高阳系统大致可以印证，然以浑为岷之孙、远之曾孙，则大有可疑。许远以在安史之乱中坚守睢阳，遮蔽江南而播名当世，岷承其荫，亦当为闻人。至元和年间，韩愈尚有《张中丞传后序》论及许远及张巡“两家子弟”事。若许浑果为许岷之孙，许远之曾孙，其世系必不可能失载于当时和稍后的史籍。再则王安石曾撰《许氏世谱》述及敬宗后人名显者，唯称许远。许浑在晚唐诗名甚著，北宋时许浑诗甚为流传，若浑确系敬宗后人，许远曾孙，王安石亦不应不提及。另外，许浑有胞弟，《丁卯集》中有诗可证，但该谱于岷以下俱载为单传，必误。因此可知《许氏族谱》所载之许浑，为后世修谱者杜撰而臆入，不可信据，《新唐书·艺文志四》称浑为“圜师之后”是毋庸置疑的。许浑有《分司东都寓居履道叨承三川尹刘侍郎大夫恩知上四十韵》诗，在“赐第成官舍，佣居起客亭”句下自注：“某六代祖国初赐宅在仁和里，寻已舍官舍，今于履道坊赁宅居止。”岑仲勉先生在《读全唐诗札记》中认为“浑为高宗相圜师之后，或即其六世孙。高宗常幸东都，圜师可得赐宅。”岑说是。胡宗愈《传》以浑为“绍五世孙”，即为圜师四世孙，恐推定世系有误。

许浑早年情况殊难详悉。《乌丝栏诗自序》云：“余牛角业诗，长不知难。”胡宗愈《传》云：“公幼颖悟，善诗词，顷刻千言，出人意表。”《宣和书谱》卷五有相似的记载：“（浑）牛角为诗，已能超出童稚，及长秀发，颇为流辈所推。”据此可知其聪颖早慧。《嘉定赤城志》卷三二记载许浑“尝寓于台”。《唐才子传》卷七对这一经历亦有记述：“早岁尝游天台，仰看瀑布，旁眺赤城，辨方广于非烟；蹑石桥于悬壁，登陟兼晨，穷览幽胜。”这

段经历大约在二十多岁时。此前许浑已初入科场，越中之游，使年轻的许浑颇生方外之思；不过，这并不可能改变他对仕进的追求。但这一道路似乎过于坎坷而漫长。在数次“下第泣秦京”之后，许浑踏上了“更携书剑客天涯”的道路。长庆四年（824），浑北游塞上。宝历元年（825）春抵蓟门，恶节度使拥兵自重，旋返。文宗大和六年（832），礼部侍郎贾餗知贡举，许浑应进士举及第。《及第后春情》诗云：“世间得意是春风，散诞经过触处通。细摇柳脸牵长带，慢撼桃株舞碎红。也从吹幌惊残梦，何处飘香别故丛。犹以西都名下客，今年一月始相逢。”自初入科场，忽忽二十余年，此番及第，少年梦成，春风得意。

从大和六年（832）及第到开成三年（838）正式授官，其间许浑有一段仕途迂回。究其原因，许浑过礼部试后，未过关试，依例需到节度幕中担任幕僚，得其论荐，方可释褐。因此，开成元年（836），他受弘农公辟请，自润州赴南海参卢钧幕。开成三年（838）春自南海归京口丁卯桥村舍，初秋赴宣州正式除当涂县尉。四年（839）秋摄当涂令，次年移摄太平令，旋擢为监察御史。许浑在察院，刚方苛严，不肯阿附权贵，以至婴鳞人主。后虽为皇恩所宥，但终不能见容于权贵。会昌三年（843），浑辞职东归，责授润州司马。会昌六年（846）三月，武宗卒，宣宗即位，政治形势发生变化。当年秋，许浑自京口西上千禄，大中三年（849）复拜监察御史。据《乌丝栏诗自序》，此次再莅察院，当年便“抱疾不任朝谒，坚乞东归”。大中四年（850）三月，在丁卯桥村舍将所作五百篇自编成《乌丝栏诗》。

史载许浑有任睦州刺史之经历，因其诗篇中未见明确题识，故学人颇多致疑。今考金华朱集成堂刻《建德县志》卷九《州府升迁表》“睦州刺史”题名，“许浑”记载于郑承休与李文举之间。另考宋陈公亮《严州图经》卷一《贤牧门》后附题名：“郑承休，大中三年十月自果州移刺睦州；李文举，大中六年四月自宗正卿拜。”许浑之刺睦，则当在大中四年（850）至大中五年（851）。大中六年（852），许浑内擢为虞部员外郎，在任数月即请疾分司东都。时值刘瑑任河南尹，许浑与之过从甚密，屡请为之斡旋，一麾出守。大中八年（854），以刘瑑荐达，任鄂州刺史。十二年（858）三月，盐州刺史刘皐遭宦官杨玄价诬构谋叛罪名被杀戮，“阖朝公

卿，面折廷诤”⁽²⁾，许浑亦作《闻边将刘皋无辜受戮》诗力讼其冤。咸通年间，浑擢为侍御史再度入朝，曾往会稽秦望山压胜。宋人范垫、林禹《吴越备史》卷一载：

咸通中，京师有望气者言钱塘有王者气，乃遣侍御史许浑、中使许计赍璧来瘞秦望山之腹以压之。使回，望气者言，必不能止。

这是有关许浑生平最后事迹的记载，其卒年盖在此后不久。

二

在后世人们心中，许浑是一个心乐林泉，超逸遁世之士。陆游《读许浑诗》云：“裴相功名冠四朝，许浑身世落渔樵。若论风月江山主，丁卯桥应胜午桥。”放翁此诗颇能说明后人眼中许浑的形象。然而，从其一生经历来看，他的入世之愿、求仕之心从未泯灭过。潇洒江南，高蹈山林，则往往是暂时的，并且总深藏着“避世学相如”的良苦用心。察其深意，是对晚唐黑暗政治的回避与抗拒。综观《丁卯集》，始终深植着积极入世、要求建功立业的思想感情。在《早发寿安济永济渡》中，他曾坦率地宣称自己“会待功名就，扁舟寄此身”。《谢人赠鞭》中，他热情感谢朋友送来的蜀国名鞭，满怀壮志地表示：“莫言三尺长无用，百万军中要指挥！”这种入世思想化作民胞物与的情怀，使他“軫念疲羸”⁽³⁾，为惨死于战祸的戍边战士吟歌当哭：“夜战桑干北，秦兵半不归。朝来有乡信，犹自寄征衣。”（《塞下》）这种入世思想融于正直的人格，使他不仅在入仕前敢以一介儒生奋笔成诗为受诬相国宋申锡诉冤，而且在老之将至，行将悬车时，不辞为刘皋无辜受戮痛斥宦官。而这种入世思想渗入忧患意识，更使其咏史、怀古诗涵融今古，成为不朽的历史预言。试读以下两首：

《咸阳西门城楼晚眺》：

一上高城万里愁， 蒹葭杨柳似汀洲。
溪云初起日沉阁， 山雨欲来风满楼。
鸟下绿芜秦苑夕， 蝉鸣黄叶汉宫秋。
行人莫问当年事， 故国东来渭水流。

《金陵怀古》：

玉树歌残王气终，景阳兵合戍楼空。
 松楸远近千官冢，禾黍高低六代宫。
 石燕拂云晴亦雨，江豚吹浪夜还风。
 英雄一去豪华尽，唯有青山似洛中。

诗人登高望远，透过古都荒凉历乱的山河陈迹，追抚历史的创痛。展示在眼前的正是当时朝朝琼树、夜夜璧月之地，而如今夕阳衰落，风雨欲作；满殿千官贵冑，尽成荒冢野鬼；秦苑汉宫，六朝台殿，连同紫气皇祚，咸委绿芜黄叶，禾黍积莽。诗人椽笔挥洒，牢笼着几个世纪的沧桑迁变和人事殒落，以历史映衬现实，给人以深刻的理性启示。

许浑诗每涉怀古，元人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七云：“浑乐林泉，亦慷慨悲歌之士。登高怀古，已见壮心，故为格调豪丽，犹强弩初张，牙浅弦急，俱无留意耳。至今慕者极多，家家自谓得骊龙之照夜也。”这里，辛氏已参透了许浑“乐林泉”现象之后的慷慨壮心。这方面，清人陈维崧也有同样的见解。《钞唐人七律竟辄题数断句楮尾》其九云：“大能感慨许丁卯，别有心情赵倚楼。谁说晚唐无妙诣，二公才调也风流。”蔡居厚《诗史》曾批评许浑诗“不干教化”，称当时与“不涉道”的李远赋并号“浑诗远赋”^[4]。此说既无其它文献可证，亦与许浑创作实际不符。

许浑诗的内容是多方面的，艺术成就也是多方面的。除咏史、怀古诗以外，纪行诗也独具特色。浑之一生，由于家境不宽，“久贫辞国远，多病在家稀”（《将离郊园示弟侄》），“万里高低门外路，百年荣辱梦中生”（《题苏州虎丘寺僧院》），其纪行诗写作较多。他善于将无限心情融于景致，染出一幅幅深邃隽永的图景。这些诗中，既有如《秋日赴阙题潼关驿楼》这样的全篇佳构，更每有清新跳脱的秀句，如《潼关兰若》“远帆春水阔，高寺夕阳多”；《沧浪峡》“一声溪鸟暗云散，万片野花流水香”；《南海府罢南康阻浅行侣稍稍登陆》“山鸟一声人未起，半床春月在天涯”；《守风淮阴》“一潭明月万株柳，自去自来人不知”。其神味秾郁，清和纯粹，可诵可法。《丁卯集》中可与之媲美的尚有送别与怀人诗。试读《怀江南同志》：

南国别经年，云晴波接天。

蒲深鸂鶒戏，花暖鹧鸪眠。
竹暗湘妃庙，枫阴楚客船。
唯应洞庭月，万里共婵娟。

《谢亭送客》：

劳歌一曲解行舟，红叶青山水更流。
日暮酒醒人已远，满天风雨下西楼。

前者写得朗润含蓄，深挚感人，细腻的物态描绘，表现出思念友人的亲切温暖的感受和心驰神往的意绪，在“洞庭始波”的景象中抒发出“隔千里兮共明月”的美好感情。后首抒写怅别之情，从去当人醉处写不忍酒醒之别，再翻出“风雨下西楼”情之难堪，更甚于离别之时。胡次焱称道：“缱绻之意见于言外，至今读之，犹使人凄然，此诗家之妙。”⁽⁵⁾

许浑诗前人谓之“诗格清丽”⁽⁶⁾。所谓诗格清丽，主要指其偶对句稳，律切丽密，即使用拗句，也“每首有一定章法，每句有一定字法，乃拗体中别自成律，不许凌乱下笔”⁽⁷⁾。这一显著特点所形成的独特诗格具有突出的诗学意义，成为后世诗歌论衡的标的之一。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四尝云：“宋诗如林和靖《梅花诗》一时传诵，‘暗香’、‘疏影’，景态虽佳，已落异境，是许浑至语。”“七言律诗得一联云‘晴江木落时疑雨，暗浦风多欲上潮’，然是许浑境界。”这里的“许浑至语”、“许浑境界”主要是指许浑诗讲究诗法的特点，即以功力为基础的圆稳清丽、整炼意工的诗格。我们可以从词面排偶与声调平仄来阐述这一诗格的特点。

先论词面排偶。按照格律规定，律诗上下两句（主要指颌联、颈联的出句和对句）字面句式、词性、词义要一一对应，形成骈俪的对仗形式，以产生整齐对称之类。上官仪、僧皎然在理论上概括提出“六对”、“八对”的名目，杜甫则以其创作实践树立了格律精细的典范，大大提高了诗歌修辞艺术。晚唐诗人普遍重视诗歌形式，而许浑诗更专注地推研词面，当骈俪处几乎无不偶对工整，其中不少都堪称精致工丽，情辞俱佳。如地名对：“山昏函谷雨，木落洞庭波。”（《送前缙氏韦明府南游》）史事对：“荆树有花兄弟乐，橘林无实子孙忙。”（《题崔处士山居》）山水对：“水声东去市朝变，山势北来宫殿高。”（《故洛城》）天文对：“星河半落岩前寺，云雾初开岭上关。”（《早发天台中岩寺度关岭次天姥岑》）数量对：

“碧云千里暮愁合，白雪一声春思长。”（《和浙西从事刘三复送僧南归》）色彩对：“雨中耕白水，云外斫青山”（《王居士》）花木对：“刘伶台下稻花晚，韩信庙前枫叶秋。”（《淮阴阻风寄呈楚州韦中丞》）除以上内容外，人名、宫室、器物、饮食、人伦、方位、文事、干支，在许浑诗中无不成对，就形式而言，实字、虚字、联绵字、叠字、双声、叠韵，无不可对。诗人在对偶形式中使事、咏史、写景、状物、抒怀，大都熨贴匀称，工而能化，别具深心。在内容表达上，或各种意象相互补充，扩大表现范围，增加感情容量；或形成对比，使浅近描述成为突出的刻画，加强表现的力度。这样的对句体现了诗人的慧心妙腕和深厚的艺术造诣。但也有一些篇章中过分追求整炼对称的美感，反失之板滞；有些诗通篇作对，缺乏流动之气；有些就一句看，刻画颇为生动，但上下两句却有牵合之感，景与景之间跳跃断续，缺少主体联系；有些诗意象对应固定，且得意之句重复使用，这些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美感表现。

再论声调平仄。对仗亦要求上下句声调平仄对立，使得抑扬顿挫，和谐有致。晚唐近体诗创作已臻成熟，用韵颇严，许浑诗更谙于韵律，粘对得法，平仄合辙，并时作拗体，以击撞波折克服用韵过于圆熟顺滑的弊病，形成别具一格的“丁卯句法”。拗体在唐诗发展中初唐多见，乃属不自觉而为之，至盛唐杜甫吸收吴音，七言诗中以古人律，作有十九首拗体诗，“不止句中拗一字，往往神出鬼没，虽拗字甚多，而骨格愈峻峭。”方回批评江湖派诗人学用拗字，“喜许浑诗‘水声东去市朝变，山势北来宫殿高’；‘湘潭云尽暮山出，巴蜀雪消春水来’，以为‘丁卯句法’，殊不知始于老杜，如‘宠光蕙叶与多碧，点注桃花舒小红’之类是也。”（《瀛奎律髓·拗字类》）从创作继承的角度看，此说不误，但只看到继承的一面，而忽视许浑对拗体诗发展的一面，则又未免偏颇了。杜甫的拗体诗，既拗之，或救或不救；许浑则在其基础上进一步向规则化、通俗化的方向发展，除少数变易二、四、六字外，一般拗于三、五字上，且出句拗第几字，对句亦以第几字救，不使落调。如“荆树有花兄弟乐，橘林无实子孙忙”（《题崔处士山居》）一联，出句第三字“有”字当平而仄，对句第三字“无”字当仄而平救之。“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咸阳西门城楼晚眺》）一联，出句第五字“日”当平而仄，用对句第五字“风”字

当仄而平，既免本句孤平，又救了出句“日”字。同样，“湘潭云尽暮山出，巴蜀雪消春水来”（《凌歊台》）一联中，以对句“春”字当仄而平时救了“暮”和“雪”两个仄声拗字。王士禛《带经堂诗话》卷一曾总结：“唐人拗体律诗有两种：其一，苍莽历落中自成音节，如老杜‘城尖径仄旌旆愁，独立缥缈之飞楼’诸篇是也；其二，单句拗第几字，则偶句亦拗第几字，抑扬抗坠，读之如一片宫商，如许浑之‘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是也。”李重华《贞一斋诗说》亦注意到杜甫与晚唐诗人尤其与许浑拗体有所不同：“拗体律诗亦有古今之别。如杜老‘玉山草堂’一派，黄山谷纯用此体，竟是古体音节，但式样仍是律耳。如义山‘二月一日’等类，许丁卯最善此种，每首有一定章法，每句有一定字法，乃拗体中另自成律，不许凌乱下笔。”将不求合律的古体拗律改造、纳入律诗创作的轨道，成为符合规则的今体拗律，使这一形式既峭拔崛奇，气力厚重，又稳顺中节，严谨不紊，从而更通俗化，更易掌握和利用，这正是许浑在晚唐的历史条件下对杜甫诗格艺术的继承和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诗学意义。

许浑诗格清丽也与许浑诗工于写水创作特色有关。《桐江诗话》云：“许浑集中佳句甚多，然多用水字，故国初士人云‘许浑千首湿’是也。”^[8]其实他的诗，不但“水”字用得特别多，波涛、浪花、雨露、霜雪……在在皆是。清编《全唐诗》所收许浑的五百三十一首诗中，用到“水”字的有二百首，用到“雨”、“露”等字的有二百五十一首，两者约占其诗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五，真可谓一个湿漉漉的世界。

“许浑千首湿”这一特殊文学现象的形成是儒道佛三教对诗人综合影响的结果^[9]，其中佛教思想影响可能更为明显。在修禅悦佛之风盛炽的晚唐社会，文人士子皆忻翹向禅，在以“诗无僧字格还卑”^[10]，极力用佛禅装饰词章的背后，心理上也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许浑同样深受熏染，他对生活的感受体验与佛教理念深有契合。水在佛教，尤其在禅宗里被视为清静无瑕，湛然恒静的境界，普度众生的圣物，许浑许多“湿诗”采用佛典禅语，所演绎的便是这一义理。当然，“许浑千首湿”的形成也与诗人长期所处的地理环境有关。诗人举进士前生活在水乡润州丹阳，家乡的水滋润着诗人的心田，陶冶了诗人的性灵，诗人曾以水鸟自

况，委婉地倾诉“故巢迷碧水”^{〔1〕}的痴情。后来他几次徙家，或傍伊洛，或临洞庭，或濒长江，最后在“小桥通野水，高树入江云”^{〔2〕}的润州城南丁卯涧定居，其任地方官亦是“泽国”姑熟、睦州和江城鄂州。这样的地理环境不但为诗人的创作提供了大量直接的、感性的描写对象，而且不断加深着诗人对水的感情。上述这几个方面是互相渗透、互相作用的。历代诗人辈出，他们的诗中也或多或少地写到水，只是由于不太突出而被其它艺术特色所掩盖。而许浑写水最多，并能独树一帜，成为形成“清丽诗格”的重要因素，这一特色就必然引起人们的注意了，也使许浑诗在中国古代诗歌宝库中具有特别的魅力。

许浑诗在晚唐之际有比较大的影响。他的朋友杜牧《寄江南许浑先辈》诗心许其“江南仲蔚多情调”，张祜《访许用晦》诗有“酒兴曾无敌，诗情旧逸群”句称道其诗酒豪兴。韦庄《题许浑诗卷》更激赏道：“江南才子许浑诗，字字清新句句奇。十斛明珠量不尽，惠休虚作碧云词。”后蜀韦穀《才调集》选许浑诗达二十首，此集入选二十首以上的仅李白、元稹、许浑、杜牧、李商隐、温庭筠、韦庄等七人。

从花间词人孙光宪以“不干教化”批评许浑诗，五代以降对许浑诗毁誉不一，有宋一代，渐成聚讼。范晞文《对床夜语》卷二云：“七言律诗极不易，唐人以诗名家者，集中十仅一二，且未见其可传。盖语长气短者易流于卑，而事实意虚者又几乎塞。用物而不为物所赘，写情而不为情所牵，李杜之后，当学者许浑而已。”这一评价，似有溢美之处，但许浑七律格调凝炼，对偶精切，工巧清丽，确实超逸群伦，自成诗格。这种诗格，比较符合宋代随着经济增长和文化水平提高而出现的市民阶层的审美情趣，亦为许多文人士子所欣赏。胡应麟《诗藪·外编》卷五称寇平仲“江楼千里雪，雪屋一龛灯”得之于许浑诗句，言之有据。即如苏轼“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梅尧臣“山色临关险，河声出地长”，陈允平“石屋雨来春树暗，海门潮起暮云高”，亦显然点化于许浑“唯应洞庭月，万里共婵娟”，“树色随山迥，河声入海遥”，“湘潭云尽暮山出，巴蜀雪消春水来”。但这种诗格却与江西诗派立意排俗，开拓自立，推陈出新的诗学主张大异其趣，所以陈师道首先起来批评其世俗化的倾向，云“后世无高学，举俗爱许浑”（《次韵苏公西湖观月听琴》）。然而，在南宋诗人们对江

西派诗风反省的过程中,许浑诗再度引起了普遍的重视。陆游《跋许用晦丁卯集》称其“大中以后,亦可为杰作。自是而后,唐之诗益衰矣”。后人读剑南诗,举出“数点残灯沽酒市,一声柔橹采菱舟”;“高柳簇桥初转马,数家临水自成村”;“似盖微云才障日,如丝细雨不成泥”等“更仆难尽,无句不工”的诗句,谓乃“时仿许丁卯”^[13],足见陆游对许浑诗之推尊。后来江湖诗派诗人进一步自觉地以学许浑之工来矫正江西派之粗。江湖诗派代表诗人之一周弼“以唐诗自鸣,亦惟以许集谆谆诲人”^[14]。其《唐三体诗》中许浑诗选入十七首,与杜牧相同,为入选数最多者。一时间江湖诗人中形成了“言古文止于水心,言律诗止于四灵、许浑”的局面。这一风尚,曾引起江西诗派殿军方回的大肆讥评。然而,从那些明显带有门派之见的不遗余力的批评中,恰恰可以看出庞大的江湖诗人群体学习许浑的潮流是何等强大。元大德十一年(1307)王瑋《丁卯诗集序》云:“晚唐诗人彬彬,辈出名家,当时传诵来裔,可谓甚盛。比年以来,学者唯多宗许鄂州。”这与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七所云“至今慕者极多,家家自谓得骊龙之照夜”相映证,足见由南宋迄元,许浑诗深受宝爱,其影响在不断扩大。

明清两代对许浑诗的评论仍主要集中在“诗格”上,欲抑者谓之过于工巧,失之卑近,“途轨纷出,渐入宋元”^[15],欲扬者谓之“格甚凝炼”,“绰有家法”^[16]，“诚盛唐之气象”^[17]。这一阶段,前人对许浑诗的每一份称赏几乎都受到驳难,而每一个驳难又引起反唇相讥,从而导致对许浑的进一步认识和肯定。综观明清唐诗选本和《丁卯集》的编纂整理以及学人的评论,可以看出,其时尽管有贬抑的意见,但许浑诗还是受到普遍的重视。《唐诗品汇》收录许浑诗至百余首,可谓甚多。高棅将“许用晦之偶对”与“杜牧之豪纵,温飞卿之绮靡,李义山之隐僻”并举。胡应麟《诗藪·外编》卷四也将许浑与杜牧、温庭筠、李商隐并推为“晚唐铮铮者”。沈德潜《唐诗别裁》选其诗十五首,在晚唐也仅次于李商隐、杜牧、温庭筠,列为第四。金圣叹《选批唐才子诗》入选许浑诗更为全书之冠,叹赏备至。对许浑诗格,回护者极多。贺裳《载酒园诗话》卷一从反面拈出孙光宪极诋许浑之语,谓“愚意浅则有之,陋亦未然。诗诚不能超出晚唐,晚唐不及许者更自无限。即如孙光宪,亦仅能作《浣溪沙》、《菩萨

蛮》小词，有何格律可称？”薛雪《一瓢诗话》也讥哂诋毁许浑诗者“竟似道听途说，不曾亲读此公诗”。田雯《古欢堂集杂著》卷三则谓“声律之熟，无如浑者。七言拗句，……亦自挺拔，亦饶风致，似不可过诋丁卯也”。这些论述看到了许浑格律诗的圆熟并肯定其美感价值，是比较公允的。

明清人论许浑诗，“诗格”之外还涉及“气体”问题。“气体”与“诗格”不无联系，又具有独特的意义，它往往是指诗歌的气局风骨，亦即总体艺术风貌。黄子云《野鸿诗的》云：“许、赵诸人，专以字句取媚，而气体日趋卑弱，且少完作。”许学夷《诗体辨源》卷三十云：“愚按，晚唐诸子体格虽卑，然亦是一种精神所注。浑五、七言律工巧衬贴，便是其精神所注也。若格虽初、盛，而庸浅无奇，则又奚取焉。孟子曰：‘五谷者，种之美者也，苟为不熟，不如萁稗。’以此论诗，则有实得矣。”黄氏云浑诗“气体日趋卑弱”，只是严羽以后文人对晚唐诗批评的套用，与方回“晚唐诗家吟不着，卑而又俗，浅而又陋”如出一辙。许学夷之论看到许浑诗的内在价值，其见识已超出方回诸人；然谓许浑之诗较之于盛唐诗，仍有谷、稗之分，则又落入传统的以时界诗，以正变论诗的窠臼。初、盛、中、晚，时代不同，社会生活亦不相同，文学创作必然打上每一个特定时代的戳记。如果强以盛唐诗的气局衡量晚唐，则不可能别有“一种精神所注”了。丹纳在《艺术哲学》中说：“悲伤既是时代的特征，他在事物中所看到的当然是悲伤。……在悲伤的时代，周围的人在精神上能给他哪一类的暗示呢？只有悲伤的暗示，因为所有人的心思都用在在这方面。他们的经验只限于痛若的感觉和感情，他们所注意的微妙的地方，或者有所发现，也只限于痛苦方面。”这是分析文学艺术创作与现实生活关系的切中肯綮之论。从这一观点看，许浑诗虽不能如盛唐诸公之雄浑，却未可言其气体卑弱。晚唐社会，国祚将尽，万方多难，残照的血色映入诗境必然带有悲凉萧瑟的情韵。大气流转、浑灏万里的情境更多地为匠心独运、精致刻画的画面所代替，这是时代使然，也是许浑这一“晚唐铮铮者”诗歌的“别一种精神”的根柢。吴乔《围炉诗话》卷十称“许浑诗有力量”，贺裳《载酒园诗话又编》称许浑诗“在晚唐亦为振拔”。这种振拔之力量，正是许浑在唐末风雨飘摇的时代中显示出的独特的洞察力和借

助充分格律化形式的艺术表现力。

三

许浑诗集，初名曰《乌丝栏诗》，乃作者本人大中四年三月在丁卯涧村舍“編集新旧五百篇”而成。由于编辑较早，故晚年之作不在其集。这一自編集历经晚唐五代战乱与唐宋鼎革，大多散佚，所幸许浑书法为士林所尚，经过宋代几位文人的长期搜求，这一诗集的残卷才得以保存下来，南宋时岳珂得之，将其编入《宝真斋法书赞》卷六。其《乌丝栏诗真迹跋》云：“右唐郢州刺史许浑所书乌丝栏诗一百七十一首真迹，分上下，凡二卷，织组间错，辞格华古，笔妙灿然，见为三绝……浑本丹阳人，居丁卯涧。予再仕是邦，每过其旧居，遐揽云山，慨想清致，未尝不过车而式也。安阳刘涇巨济，故与宝晋同时，博雅尚古，诗藏其家，盖与太冲序，俱在秘笈第一物之数……予家旧传幅绢贴，知其为晚唐诗。嘉定癸未岁，客有自中都携来者，始见首卷，制作吻合。序著五百余篇，合两者才得六十五首。冥搜逾年，复得后一卷。略计所存未及半，岂犹有待耶。”《乌丝栏诗真迹》是许浑诗作第一手资料，但从岳珂的《跋》中，尚难以断定许浑自编《乌丝栏诗》是否即与《真迹》一样，“分上下凡二卷”。北宋后期著名藏书家贺铸自编自校《丁卯集》二卷本，其《跋》云：“浑《自叙》本三卷，凡五百篇。今世传止两卷：上卷七言一百八十篇，下卷五言一百九十六篇。”据贺方回跋语，《丁卯集》最初当为三卷。三卷本在宋人著录中见载于《崇文总目》卷五，刘克庄《后村诗话》新集卷三也记录许浑有“古律诗三卷，名丁卯集”。然《新唐书·艺文志四》、《郡斋读书志》卷一八、《直斋书录解題》卷一九皆录为二卷。看来，自两宋始，二卷本已成为通行本了。

今传二卷本有两个南宋本，即蜀刻本和书棚本。蜀刻本在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中曾提及，范希曾和万曼都认为《续古逸丛书》影印《许用晦文集》二卷、拾遗二卷，其底本即陈氏所谓蜀本。此本收诗454篇。书棚本《丁卯集》底本为北宋神宗时所编，后经南宋宁宗时临安睦亲坊书商陈起刊刻而通行。黄丕烈曾收藏两个宋槧，其后一藏本“较前故楮

墨更精”，常熟归止庵影钞此本，《四部丛刊》又据归本影印。此本收诗三百篇。

元代许浑集今传大德刊本《增广音注唐郢州刺史丁卯诗集》二卷续集一卷。其题下署“刺史许用晦撰，信安后学祝德子订正。”正集收诗三百五十七篇，续集收九十七篇。此本明清影印、翻刻较多，日本帝室图书寮所藏亦与此元刊二卷本相同。

明代与宋元版本系统不同的有崇祯十年北陵许氏刻本。此本系据许浑二十四世孙许衣云手抄本剞劂^{〔18〕}，虽亦为二卷，但上卷编次迥异于诸本，下卷略同于明弘治郑杰刊本。前有宋胡宗愈《唐许用晦先生传》，上下卷间有雷起剑评点。另有《唐音统签》钞本九卷，据胡震亨序曰：此本乃“据大德中信安祝得甫本复加厘正，益以别见者二十馀篇，合得四百五十五篇”。清编《全唐诗》，在《唐音统签》和季振宜《全唐诗稿本》基础上再加采补，共收诗五百三十一首，当属较为完备。

自唐末迄明，许浑诗皆无笺注。乾隆二十一年（1756），许培荣笺注《丁卯集》八卷，惜其侧重点评而笺注甚为浅略，且诗作收录多有遗漏，又误将他人所赠诗作为许浑诗加以笺注，相当草率。今以清编《全唐诗》所收许浑诗为依据，在甄辨重出互见诗及补订佚诗的基础上逐一详加校笺。现就甄辨重出诗、补遗及笺注体例三个方面略作说明。

许浑诗重出互见现象是极其突出的。据清编《全唐诗》所录五百三十一首诗统计，约有八十五首与二十三位唐代诗人作品重出（另有二首与宋人诗重出）。其中一篇与数人之作重出，或既与他人又与本人重出的现象也每每可见。所重作品，尤以杜牧名下者为多，共五十六首。杜牧名下收录这些诗，显然源于《樊川集》之《续别集》。此集在南宋时流传过，其时洪迈《万首唐人绝句序》已指出：“金华所刊杜牧之《续别集》，皆许浑诗也。”刘克庄《后村诗话》前集卷一也指出：“樊川有《续别集》，十之八九皆浑诗。”这部分诗，岑仲勉、吴企明、陶敏、佟培基、葛兆光、李立朴、吴在庆、胡可先等先生均作过辨正。在此基础上，本书据许浑真迹、蜀刻本、书棚本等版本及其它各种有关资料进一步作出全面的甄辨。同时，对许浑与其它诗人重出之作也作出了归属判断。有些作品的归属问题比较复杂，未可遽定，谨提出一些意见供学界参考。